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忆恭生	唐金鹤
【诚心忏悔】	生命的暗夜	陆晓娅
【史实辨正】	用推理探寻历史真相——答刘进、宋彬彬对我质疑的回应	华新民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忆恭生

• 唐金鹤 •

A. 我们班的许恭生

2008年是我们冶金系焊8班毕业四十周年，我们班很多同学重返清华园，在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欢聚一堂，重温过去的快乐时光。但是，在我们的欢声笑语里，却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当年和我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一起上课的同班同学许恭生，在清华大学的5.30大武斗中不幸丧生，长眠在地下已经四十年了。一想到此，我们就感到了一种透骨的凄凉，一种难言的哀伤。

许恭生，小名银波，江西临川人，1944年4月9日生，1956年考入南昌市第三中学，1962年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他中等偏高，瘦瘦的身材，大大的嗓门。他永远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是一个从来都闲不住的人。他很喜欢和别人辩论，经常在走廊里就可以听到他和别人在宿舍里辩论的声音。他人很聪明，学业成绩优秀。

当年我们每天在一起，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锻炼，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讨论问题。我们亲如兄弟姐妹一般，生活得非常愉快。

许恭生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学习击剑的。白天他和我们一样地上课，只在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他才去学校击剑队学习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晚上又和我们一样上晚自习了，他一个星期练习击剑的时间最多是十个小时。但是，由于他的动作敏捷，反应迅速，有着天生聪明伶俐的头脑，又学习得法，使得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展露出了他在击剑方面的天赋。他曾两次获得北京高等院校大学生运动会重剑击剑冠军。当年的他，真是一个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小伙子啊。

但不幸的是，在他的人生旅程中遇上了文化革命。在文化革命中，他担任了老团一个连队的指挥员，站到了武斗的最前线。就我们现在收集到的数据，1968年4月29日，许恭生

带领一批老团，闯进九饭厅，砸老四的饭锅。5月14日，他领头进攻汽车楼，把一套军用刺杀服丢给了老四。5月17日，许恭生又带人装扮成农民，假装在主楼南面的农田里锄地，捉了回校取粮票的和统。5月23日，我在动农馆桥被老团绑架，事发突然，当时我没有看清有没有许恭生在场；但到了1号楼审问我时，我可以肯定有许恭生在场。5月29日，许对我们班的同学讲，他病了，想回南昌老家休息。但在5月30日，他竟然带病上场了。他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清晨他受了伤，拖到下午，他就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

下面请看自动控制系1966级研究生和统的回忆：

我本来是1966届毕业的研究生，因文革滞留在校，我是属老四观点的一般群众。1967年初，我去河南串联，患了急性肝炎，所以有相当长时间，我没有参与学校的运动。像414串联会的成立，老团和老四曾要大联合，后来又分裂，这些我都只是听说，我都不在学校。我原是校中长跑队的，许恭生是击剑队的。1965年，我曾代表校学生会代表队工作组赶去外校观看了北京高校击剑比赛，看到许夺得重剑冠军，很高兴并向他及其他清华优胜者祝贺。清华武斗开始后，我就听说许恭生成了老团的武斗教练。我们之间没有交恶，可没想到他竟然来抓我。

1968年4月底，学校武斗升级，我回到北京的父母家居住。有一天，我的同室同学研究生赵先恒（老团）跑到我家，来通知我，老团抢占了研究生住的3号楼，让我们快去把自己的行李搬出来。于是我们两人骑车回校。由于守楼的老团不让老四进去，赵进去把我们的东西从三楼的窗户用绳子吊下来，我在楼下墙根接应。然后两人再合力，把行李搬回城里各自的家。

5月17日，压0班的张友松到我家来，邀我一起回学校看看老四是否有集会；我也想去系馆取五月份的粮票。我们根本不清楚学校武斗的发展。张乘车到五道口，我们会合后，一起回学校。当年主楼广场南面是一片农田，中间有一条小路通往学校。我推着自行车，和张一起往西主楼方向走去。其间，我看到了有一批农民在田间锄地，就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些农民干活排得这么整齐。我心里还在纳闷，突然，这几个农民不干活了，冲了上来，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自行车。这下子我看清楚了，为首的就是许恭生；围住我的人拿着的根本不是锄头，而是长矛等武器。许恭生把我的自行车交给没拿长矛、空着手的学校足球队的××。许抓住我的腰带说：“和统，你是老四武斗队的。”我听了以后，很生气地说：“许恭生，你不可造谣！我没有参加武斗！许恭生，我认识你。”他说：“你还威胁我？！”他又大声地对他们的人说：“这人能跑，别让他跑了。”他们不认识张友松，误以为张是外校的，是在看热闹，就过去驱赶张走开。我知道我已是在劫难逃了。我怕他们再抢我的手表，就连忙除下手表，扔给离我已有20多米的张友松。但立刻就有人跑了过去，抢走了我的表。

他们把我从校外押进学校，沿路有不少市民围观。我为自己在校外，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的被抓，感到愤怒，也想不通，为什么许恭生无中生有，说我是老四武斗队的？为什么要抓我？

我被押进9003大楼，他们先把我的白衬衫脱了，用它把我的双眼蒙住，用拳头打我的腹部。由于眼看不见，第一拳打来时，没有思想准备，肚子里疼痛难忍。后来再打，就比较能忍了；因为我是运动员，腹部有一些肌肉，只要腹部一绷紧，就不太疼痛了。也有人用铁棍的一头，捅我的臀部上方，这人还算手下留情，只伤了我的皮肉（后来发现，我的长短裤上都留下圆形血迹），没伤我的骨头。然后，用绳子把我的两手捆着，让我拿着棍子的一头，由别人牵着走。由于蒙我眼睛的衬衫有些缝隙，我凭一些余光片影，判断着行进的路线，从照澜院、经二校门走到学生宿舍区。突然有人喊，“老四打弹弓了！”我听见旁边的人快速移动脚步。突然感到我的头部被重重一击，老四打来的砖头不偏不倚击中我这个“瞎子”的头顶，当时流了不

少血，白衬衫被染红了（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我立刻被带到11号楼。在一楼，有一位男护士来看我，解开我眼睛上的白衬衫，并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和处理。他说：“你没有脑震荡。”之后仍蒙起我的眼，送我上到五楼。经过楼道时，故意让我从双人床的一头爬进去，再从另一头爬出来，如此经过了两三个双人床，想造成我对楼道有一种很难穿过的印象。然而，我听见站在我旁边，帮我穿越的一个女生在笑，而且他们根本没有爬越的艰难。我估计这是一种小儿科的计谋。等到第二天我去厕所时，他们不再蒙我的眼，因为他们也嫌麻烦。我一看楼道里，靠墙放了几个双人床，我从旁边空档走过去，根本不用爬床。

吃晚饭时，松开了我的双手。饭后，又把我双手在背后绑住，并固定在一个光床上，没有垫被，没有枕头。虽然睡觉的姿势很不舒服，但由于神经紧张了大半天，一旦松弛下来，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我从床上解下来，然后登记我的名字、班级等，我坚称自己没有参加武斗。一天三顿白米饭，菜也不错，可能是给武斗队员的伙食，我这个囚犯也享用了。许恭生始终没有露面。我想，既然被抓进来，就不会轻易释放。我担心的是，我父亲被关在他们单位的牛棚里；母亲在家，见我长期不回去，一定非常惦记我。她的血压很高，万一知道我被抓，一定会赶来学校，对她的健康非常不利。但我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很着急！

由于我在的房间朝北，对面就是老四的12号楼。虽然老团用木板把窗户钉死了，但有很大的缝隙，我能看到12号楼顶上的瞭望台，也能听见双方喇叭的广播。老团没有再绑我的手，那就舒服多了。我就在书架上找一些书看。晚上由于“灯火管制”，天一黑，就只能睡觉，就是大喇叭广播，也照睡不误。

5月30日，天还很黑，就听见楼道里很多叫喊声，外面也不平静。我赶紧趴在窗边往外看。在有限的视角中、强烈的灯光下看到的都是人们在紧张地跑动；也听见人们在呐喊，12号楼发出叫好声。天有些蒙蒙亮、到大亮，也看见12号楼东边的空地上，老团在向东边来的土坦克扔燃烧瓶；在手推车车架上装上自行车内胎，向东边发射砖头等，估计是防守从东边来的老四。到了中午，安静了一会，不久好像一方用火攻了，引起大火。12号楼没声了。老团的广播一片胜利的气氛，我猜想战斗结束了。

傍晚，从12号楼出来几十人的武装队伍，整齐地向东边撤离；在东边还有更多的武装队伍在接应他们。在我的感觉中，老四是被打败了，放弃12号楼了。

但很快，我就听到老团的广播，许恭生死了。我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两周前，许恭生无缘无故地把我抓了进来，我虽然是无辜的，但是我也为他短暂的生命感到惋惜。许恭生抓了我，却没有能够审问我。后来是一个老团的小头头来审我，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一出门，在走廊里就大声说：“尽抓些没用的人！”

后来，我通过看押我的人，寄信给哈尔滨的蓬铁权，请他将我给母亲的信寄到家中，告诉她老人家，我出差外地，短时间无法回家。我们系几位老团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来11号楼看望我，都证明我没有参加武斗。我的弟弟和宽也跑来了。他后来告诉我说：那天他离开关押楼时，有一个看守对他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把和宽误认是我）。看来，许恭生死后，再没有人诬证我的武斗身份，对我的看管也宽松了。

我在房间里找到一本英文书：艾丽斯漫游记，可以作为消遣。我也从老团的广播中，了解到清华武斗的进展，如老四由刘万章带领，从8号楼撤退到科学馆；老团火烧科学馆，广播说是老四烧的，我不信，哪有自己烧自己的；武斗升级死人，老四在城里的抬尸游行等等。我忧

心忡忡，感到中央为什么不管呢？还要死多少人？这个政权不保护学生吗？在被关押后期，老团将被关押的老四人员，集中学习过一两次，每次一个小时；见到被关在12号楼我的导师吴麒、我好友电机系教师阎石，还有老四守东区浴室被俘的人员。

7月上旬，我突然被释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似乎只放了我，吴麒、阎石也不是武斗人员啊，那些难友都没有被释放！

我一出来没回家，先到学校家属区的吴家、阎家，向两位师母报平安，说两位老师在里面，生活还可以，让她们放心。

武斗后，在我们回校集中学习时，我找到了足球队的××，要回了我的自行车和手表。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以“革命的名义”，可以随便抓人，可以随便抢走他人的任何东西。我的自行车的内胎没有被拿去做弹弓，我的手表也能完璧归赵，客观上，是受到了××的保护。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足以让很多人动心，要据为己有了。我被公然抢走的自行车和手表，居然还能够要回来，这在当时是很少见到的现象。

这些事过去已经40多年，很多事已经记忆模糊，但有些事的细节却还记得很清楚。趁我们这些人还在，把一些历史记录下来，以便大家反思文革，不希望那段历史重演。

和统在这里记下的，是一个普通清华学生被许恭生抓去、被老团关押的全过程。许恭生带人抓了和统，和统在等待许恭生的审问，但等来得却是许的死讯。人生真是难料啊！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像许恭生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年青人，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能给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如果许恭生能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以他旺盛的精力，以他那透顶的聪明，以他的文武全能，那肯定是一个百万元、千万元都挡不住的大款，天妒英才啊！

B. 许恭生之死

当年在东大操场北边，有一排小白杨树。树的北面是一条土路，土路北边是一片坑洼不平的荒地。荒地上杂草丛生，乱石横躺竖卧。1968年5月30日，这里成了武斗的战场。上午七点钟，许恭生就在这片荒地上不慎摔倒，被扎成重伤；几个小时以后他才被送去医院，但太迟了，因失血过多，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a) 战地失足，被扎成重伤

早上五点钟左右，樊程带领老四三十余人，趁老团不备，沿着东大操场北面的土路迅速冲到了九饭厅前，与驻守12号楼的老四会师了。老四们很快就见到了，老团的一支队伍守住这条土路，封住这个缺口。这支老团队伍就是许恭生所带领的连队。这时，“科学馆独立排”的老四赶到了，就与许恭生所带领的连队对阵。

早上六点多钟，这边的老四看到，许恭生走到他的连队前面，给老团们做示范，教授他们如何使用长矛进行刺杀。他经常给老团上课，老四就送给他一个“教师爷”的绰号。随着许恭生所示范的一个一个的动作，老四这边的哄笑声此起彼伏，又是鼓掌，又是叫倒好，有的老四高声嚷着：“好！再来一个！”这些老四对许恭生的刺杀动作，报以嗤之以鼻的哄笑、冷嘲热讽的啸叫。我们事后分析认为，这种侮辱性的气氛，会大大挫伤许恭生的锐气。

老实讲，有不少的老四是非常惧怕许恭生的。我就听到不止一个老四对我说：“许恭生一个人可以对付六、七个人，他把长矛在那儿一挥舞，就无人能够靠近他，他一个人扎伤过多少老四啊，他太厉害了。他是高校的击剑冠军啊。”

我到了为写这本书而收集数据时，才听到老四里居然还有不怕许恭生的人。我不相信这个消息，认为这是在吹牛；但是，经过多方核对以后，我信了，老四里真的就有不怕许恭生的人。

就在老四这边起哄、讥笑、羞辱许恭生之时，出现了下面这一幕：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校设备工厂教工李光鸣手持长矛，沉着冷静地离开了老四的队伍，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他向着老团的方向大概走了五十米，在双方的阵地中间停了下来。他对着许恭生大叫：“许恭生，你过来！咱们俩个一对一，今天就在这儿比试比试。”他的这句话，无论是对面的老团，还是身后的老四，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顿时老四这边欢呼起来，向着许恭生叫起板来：“许恭生，过来！许恭生，过来！”许恭生当时在想什么我们就无法知道了，我们只知道许恭生坚决不肯走上前来，不肯和李光鸣进行一对一的较量。

许恭生坚决不出列应战，是因为李光鸣比他高大魁梧？还是因为太阳光晃着他的眼睛，不利于他的刺杀动作的发挥？无论老四这边怎么叫号，许就是不应战，于是李光鸣得胜回朝了。那当然又赢得了这群老四的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了。老四士气大振。

而身为连队指挥员的许恭生，在这么危险的武斗现场，被对方如此羞辱，这必定大大地挫伤了他与他们整个连队的斗志。

在四十几年后，我才得知5.30那一天，许恭生是带病上场的。和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告诉我：“5.30的前一天，就是五月二十九日，在7号楼的宿舍里，许恭生对我讲，他最近感觉身体不太好，疲倦，全身无力，不想吃东西。他去校医院看病，医生给他抽血做化验。我看到了他手中拿着化验单，我记得是他的肝脏不太好。他告诉我，这一、两天他就要买火车票离校，回南昌老家休息。”讲到这里，这个同学痛苦地摇着头：“哪里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5.30。5.30再晚发生一两天，许恭生也就离开学校，回家了，也就不会死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明明知道自己病了，怎么还上场参加武斗啊！”听到这里，我同样感到，许恭生死得太可惜了。他知道自己病了，还冲到了武斗的最前线，唉，可怜的年轻人啊，你这是为了什么呀？

对于许恭生在那一段时间的身体不太好、疲倦、全身无力、吃不下饭的情况，老四这边是绝对没有人会想到的。而这可能是许恭生坚决不离开队伍，不出队应战的一个原因。

以上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双方开始交手了。许恭生走在老团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他那支所向无敌的长矛，指挥着他的连队。双方就在东大操场北面的土路附近，一方冲过来，另一方挡过去，进进退退，打了几个回合。

大约是早上七点钟，老四一步步往前推进，老团向后撤退。许恭生武艺高强，一贯都是他一个人断后，这次也不例外。他面向老四，挺着长矛，一步一步地后退着；突然，他失足了，被一个小土堆绊倒在地。那片荒地坑坑洼洼，无论谁倒退着走，都会出问题。

许恭生带领的那些老团转身就跑，早就跑光了；留下了许恭生一个人躺在那里。当时许仰面朝上，四脚朝天。许恭生平时身手敏捷、动作麻利，是完全可以翻身一跃而起的；那他就不会受伤了。

但是，他躺在那里没有动，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不立刻起身？是不是老四那边对他

冷嘲热讽的啸叫，羞辱性地喝倒彩影响了他的情绪？还是刚才那个老四的出列叫阵严重地打击了他的士气？也许他当时身体不好，疲倦，全身无力，吃不下饭，他没有力气跳起来？不管怎么说吧，他摔倒以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对阵的老四们，一直盯着许恭生；他们没有料到，许恭生会突然摔倒。有人大叫：“倒了，倒了！”老四们一拥而上，许的身上被扎了二十多长矛。于是，在这么严酷的武斗现场，许恭生战地失足，摔倒，被扎成重伤。

许恭生是早上7点钟摔倒的，这个时间来自一个当年有手表的老四；工宣队进校以后，他写给工宣队的材料中记下这个时间。另一个现场的老四回忆，当时出太阳了，但太阳光是斜射的，把浴室的墙照得很亮。7点钟这个时间是可信的，我们采用了它。

我们回头来看一看，5.30那天，老团和老四双方的阵势。

那天，许恭生连队扎营在那条土路西端的北侧，老四的队伍扎营在那条土路东端的北侧。老团和老四所处的位置，一东，一西。这样的位置对老四是非常有利的，而对老团就很不利了。

第一：老团是从西往东推进。5月30日那天，太阳出来特别早，早上7点钟前后，明晃晃的阳光直刺他们的双眼。在双方拼长矛时，这可不是小事情，稍一眨眼，就可能要命呀。这刺眼的太阳光给老团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老四背对着太阳，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第二：许恭生连队要封锁那条土路，不许老四再由土路冲过来，他们就驻守在土路西北侧坑洼不平的荒地处。老团武斗前的准备、安排不可谓不周密，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么危险的地形，老团却忽视了。以致老团的一员勇将许恭生，当场在此摔倒。

下面谈一谈许恭生给414这边留下的印象。

武斗刚开始没有多久，我在焊接馆听到几个老四在说话。一个说：“见了老团，我就不怕，不是所有的老团都往死里扎人。”可是另一个说：“老团里的许恭生可厉害，他扎人可狠呢，他就是往死里扎的，我见了许恭生就跑。”当时在校的老四中，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许恭生；许恭生这个名字成了老团武斗力量的代名词。

我记得有三个老四一起在焊接馆门口找到我，其中一个老四怒气冲冲地，劈头就说：“你们班的许恭生把我给扎了，许恭生刺伤过我们好多老四，他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他。”看他气成那个样子，只因为我和许恭生是同班同学，就大有要拿我兴师问罪、狠狠地揍我一顿的意思。我当然无话可说，只有很尴尬地看着他。等他说完了，我问他：“扎哪儿了？要紧不要紧呀？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啊？”这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补了一句：“当然了，这事和你没关系。”然后他们三个转身一起走了。

这些对许恭生仇恨的种子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露头了；以致在许摔倒在地时，不仅没有人过去扶他一把，反而是一个人、两个人、太多的人一拥而上，这些人都要出出那积压已久的心头的怒气，都过去扎上了一长矛，多么可怕的仇恨啊！

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分析许恭生摔倒、受重伤这件事，他说：作战时要占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作战时的自然条件，5.30那天太阳光晃许恭生的眼，他没有占到天时。地利指地理环境，许恭生所处位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他没有占到地利，导致他不慎摔倒。但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的是人心的向背。许恭生在多次武斗中和老四积累下仇恨，

他在老四那里是失人心的。一旦让老四抓到了机会，这些平时拿许恭生无可奈何的老四们就将长矛扎了上去。我认为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团派总部委员孙毓星在清华校友网上写道：“关于许恭生，我当年就听说过他教大家‘扎屁股’，尽量避免伤及要害，以我对许恭生的了解，相信这是真实的。”孙毓星认为许恭生是心地善良的，是不可能与老四结怨的。

但与许恭生对过阵的老四，看到孙毓星的这种说法以后说：“我们搞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拼长矛时，双方面对面，长矛对长矛，屁股长在后面，要是没有孙悟空的本事，怎么能够专门去找对方的屁股扎？”他们还指出：“在5.30那天，很多人都亲眼见到许恭生在现场教其他的老团，他的双腿作出弓箭步，两手平端着长矛，朝前刺出，动作干脆有力，每一下都直指对方的胸部和腹部，每一下都是要命的啊，哪里有半点仁慈之心？只有把长矛尖有意向下，那才可以避免刺中对方的胸部和腹部。那天，很多人都看见许恭生平端着长矛，我不知道谁见到许恭生把矛尖指地，反正我没看见。”看来这些同学不接受孙毓星的这个看法。

“扎屁股”很有可能是指对方逃跑时，追击对方要手下留情，只扎对方的屁股，不要伤及要害。这点仁心，我相信许恭生还是有的，他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何况对方又是自己的同学。我相信他也有着人类的善良天性。

但是，我听到的是被扎了屁股的人都在庆幸自己当时逃跑得快，又是谁在危难时救了他，否则后面追上来的老团，肯定要了他一条命；而我从没有听到哪个被刺了屁股的人，对刺伤他的人感恩戴德。看来，老四这边只记住了许恭生的凶狠，只记住了许恭生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一点也没有体会到他的善心。

唉！许恭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年了，到现在才来讲许恭生教大家“扎屁股”，尽量避免伤及要害，来讲他也有着善良的心，已经太迟了，许恭生已经死而不能复生了，让人惋惜啊。

b) 延误送医，失血过多致死

许恭生从早上7点受伤，拖到下午才送医院。关于这个过程，我同班的几个同学，我的多个其他班级的、在现场的团派朋友，他们都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数据。

趁老团和老四脱离接触的空隙，我同班的一个男同学陆××冒险冲上前去，将许恭生背回到土路北侧、他们连队所在的空地。这个情况是陆××在事发后没多久，亲口对我讲的。

当他被背回到老团阵地时，大家都围上来，问他怎么样？伤在那里？伤得重不重？我的一个团派朋友清楚地记得，当时许恭生居然自己咬着牙站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走了几步，他安慰大家说：“没事，没事。”大家都急忙让他赶快躺下，别动，他才重新躺下。就是说，他从现场被背回来时，能说话，能走动。

一个老团同学告诉我：“许恭生被背回老团的阵地以后，在老团的阵地上躺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抬到了6号楼东南门门前的空地上。动力系量0班的女同学×××，给许做了一些包扎处理。”

我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在6号楼东侧南门前的空地上，我见到许恭生时，感到他已经不行了，他的脸色苍白，面无血色。有人脱下许恭生的裤子，我见到许大腿根部的的伤口到这时还没有包扎。那个先前给他包扎的女同学就站在旁边，她不好意思地把脸转了过去。当时的时间

是上午，还没有吃午饭。”

许恭生后来被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在医院时他停止了呼吸，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也有的同学说，许是在送院途中不治的。不管怎么说吧，一个人能有多少血？哪里禁得住这么长时间地流淌？哪怕是早一个小时送到医院，也可以救他一条命啊！

据说，许恭生身上有二十余处伤口，几乎都在双腿上。造成他死亡的致命刀口有两处，一是大腿根部的股动脉破裂，造成外出血；一是肝脏破裂，可能造成严重的内出血。

许恭生、高建枢和我，我们三个是1962届冶金系焊8班的同班同学。高建枢是我们班的老团支部书记，2010年12月22日，在清华校友网上，他写了下面一则留言：

唐金鹤：你的书倾注了你的心血，也是对清华那段历史的贡献，难能可贵，可敬可贺。我亦赞成愿逝者安宁这句话，恭生英年早逝于国于其家都很可惜。你的忆恭生一节乃成同学忘却的纪念，我相信恭生在天之灵足矣！至于文革已成历史，让以后的历史再评说吧。记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实事求是永放光芒！

我们班24个人中，22个人是团派，只有冯韵芬一人是老四。我是逍遥派。被卷入武斗以后，我才算是一个老四了。

C. 许恭生的死因分析

a) 疯狂的年代，疯狂的行为

有人在校友网上提出：“许恭生已经倒地，一个已经丧失战斗能力的人，被涌上来的一群老四扎成重伤，这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是不人道的。”对于在战场上已经倒地的敌方，国际公约上是怎么规定的，我是不知道的。但不管怎么说，老四在许恭生倒地以后，把他扎成重伤，这么做肯定是不人道的；老团在霍玉金倒地以后，把他扎成重伤，这么做肯定也是不人道的。

发生在许恭生和霍玉金身上的这么不人道、这么疯狂的事情，不是偶然的。这些疯狂行为是来自那个疯狂的时代。

从大的方面来讲，当时全国范围内都疯狂了，无法无天了。清华园内也和全国一样疯狂了，无法无天了。比如谢晋澄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老团用卡车活活撞死；孙华栋骑车路过一教，就被老团捉去，在几个小时之内被活活打死；老团的“罗文李饶项目组”和“十二人反党集团”项目组，私设监狱，私设刑堂，把被关押的人员折磨得死去活来，施暴的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要知道，这些被打死、被关押的人，不是他们的老师，就是他们的同窗啊！

在这样无法无天的大气候下，两派的武斗人员已经拿起了长矛，面对面地械斗，双方人员在武斗场上早已把仁慈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哪里还有什么人道可言？

从小的方面来讲，就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数据而言，许恭生个人与老四积怨太深。所以，当他失足倒地时，就没有一个老四上前去把他扶起来；平时奈何不了许恭生的老四们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一拥而上，以致二十几长矛扎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至于霍玉金，我们没有霍玉金个人与老团积怨的数据，老团里认识霍玉金的人好像并不多。老团的十几支长矛，一起扎在了已经倒地、没有还手能力的霍玉金的身上；并且全都刺向霍的

胸腹，全朝着霍的要害扎。看来原因只有一个，因为霍是一个老四，是“阶级敌人”；这十几个疯狂的老团，就投石落井，想将霍活活扎死。

许恭生的死讯传出以后，很多老四感到非常震惊，非常惋惜，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痛苦的。有几个老四后来专门找到我，对我说：“我们没有想要他的命。他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我们要想扎他哪儿，就可以扎他那儿；但我们都只扎他的腿，我们只想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老实点，别太狠了，他过去刺伤过太多的老四了。”

但是已经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脆弱的血肉之躯，那里经得住长矛乱刺？！他的大腿股动脉破裂，还有他的肝脏破裂，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长矛全刺在了许恭生的两条腿上。许恭生的死使我陷入了痛苦中，望着这些老四，我无话可说。

许恭生倒下了，这就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由于疯狂的行为，所带来一个悲惨的后果。我相信，这个悲惨的后果，使武斗双方的所有成员都会终生不忘。

b)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害死了许恭生

5月31号，我从北医三院返回学校。汲鹏告诉我说：“在昨天的武斗中，你们班的许恭生被老四的长矛刺了二十几下，老团没有及时送他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死了。”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

昨天我马不停蹄地送了那么多的伤员去医院；昨夜我彻夜未眠，陪着动脉血管被扎破、大出血3000多毫升的霍玉金，经医生抢救，霍从鬼门关回到人间。许恭生受的伤、大出血的情况一定没有霍严重，但是，许恭生却走了。清华园里水火不兼容的两派，把过去的同桌分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许恭生躺在老团那边的阵营里，我是不可能知道的，更不可能送他去医院了。于是，我的心中对老团非常不满：老团怎么会把他扔在那里那么久，而不送他去医院呢？若能及时送到医院，许恭生是不会死的，早一个小时就能救他一命。

40几年后，我明白了，我错怪了老团。许恭生从现场被背回来以后，能说话，能走动。现在想一想，许恭生走的这几步路，说的这两句话，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使老团思想上麻痹了，误以为他真的没事。是啊，他们一个个都是二十几岁的工科大学生，身强力壮，很少生病，医学方面的常识不多；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许恭生还能走、能说话呢，应该不是致命的伤，怎么会死了呢？如果知道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那他们一定会赶快送许恭生去医院。

当驻守东区浴室的老四走出东区浴室以后，老团按照谈判的约定，立即送那个重伤的老四伤员唐应武去了北大医院。后来，老团见到驻守东区浴室的李文兵伤势严重，又把李文兵送到了北医三院，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尽管他们把伤员扔在急诊室的门口就走人了，但起码还是扔在了医院的门口，没有扔在马路上啊！连对方的俘虏，老团都可以做到及时送往医院，没有可能老团见到了自己的爱将许恭生重伤而不送他去医院；只能说他们真的是没有料到，许恭生的伤情会那么严重，老团们被假象麻痹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许恭生受伤的情形。先讲一个有关的例子：1968年7月5日早上，从一教方向一颗子弹射中杨志军的颈动脉，血向外喷射不止。据土建系房01班姚荣达和教工李光鸣讲，血喷出来很高，根本捂不住；杨很快身亡。我们查阅了医学文献，当一个人的大动脉破裂，在血压作用下造成喷射性大出血，在没有得到任何处理的情况下，2分16秒，这个人就会死亡。许恭生的股动脉受损，但他根本就没有杨志军的这种大出血的现象。再讲一个例子：1968年7月6日，杨树立在土坦克内中枪，子弹打穿他的左肺，造成肺部大出血，

血积在胸腔内，杨也很快身亡，我亲眼见到胸腔大量积血使杨树立多么的痛苦。许恭生受伤后还能起身走动，这说明，他即使肝脏破裂，有内出血，那也是后来的事情。

老四这边的霍玉金，在5.30那一天，他也被扎成重伤，他的情况与许恭生非常相似；他的伤情比许恭生还严重。下面我们将这两人的情况进行一下对比。

霍玉金从12号楼冲出来，接应从东大操场冲过来的樊程带领的自九小分队，他一个人断后；在倒退时，被横在路上的一棵大树绊倒。许恭生也是掩护大家后撤，一个人断后；在倒退时，被一个土堆绊倒。

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倒地以后，对方的武斗人员冲了上来，将他们扎成重伤的。霍玉金被扎十几长矛，都在胸部和腹部，如果不是他内衬胸甲，当时早已没命；许恭生被扎二十几长矛，主要集中在双腿，但有两长矛刺中要害。

霍玉金被刺成重伤后，自己迅速起身，自己跑回12号楼。而许恭生被刺成重伤后，是我们班的一位同学把他背回去的。许恭生被背回老团阵地以后，他自己起身，走了几步，嘴上还说：“没事，没事。”他们被刺伤以后，刚开始时，两个人都可以站起身来走路说话，都没有出现生命危险的迹象；但是两个人的出血量都在不断地加大，然后都生命垂危。

他们两个人后面的情形就不同了。当时在12号楼里有一位校医院的大夫，这位大夫很有经验，在霍玉金能自己跑回12号楼的情况下，他要求立刻送霍玉金到北医三院；他还说送晚了就来不及了。霍玉金在生命垂危时是躺在医院里，医生及时地给他输血，给他做手术，把他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了。而许恭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给他进行包扎的是一个女同学，许恭生既没有得到仔细的检查，也没有得到专业的包扎，又再拖几个小时才把他送往积水潭医院。许恭生在生命垂危时，是躺在6号楼东南门前的空地上，任伤情发展，任鲜血流淌，最后，许恭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找过几个专科医生，他们说：许恭生的大腿股动脉和肝脏原来就已经受损，但是，还没有到破裂引起大出血的地步，所以，他仍然还可以起身、走动、说话。在他强行起身以后，起身的动作、走动的动作，使本来已经受损的大腿股动脉和肝脏遭到了进一步的拉伤、损害，本来微小的伤口被拉大，开始大出血；到这个时候，病人就出现了生命危险的迹象。对于重伤者，医生是会要求受伤者绝对躺下，绝对不能再起身、走动；然后尽快送往医院抢救。

许恭生受伤后，咬着牙站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走了几步路。现在看来，正是这几步路，使他的伤情加重；正是这几步路，麻痹了老团，延误了把他及时送往医院。这几步路使他跨过了奈何桥，进入了鬼门关。

那个年代，我们喊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活着干，死了算。这些口号是报纸上每天宣传的、我们每天学习的。我们哪里学过要爱惜自己，有谁教育过我们要珍惜生命？我们那个时代，真拿人命不当回事啊！许恭生已经全身无力，吃不下饭，竟还冲上了武斗的第一线；他在受了这么重的伤的情况下，竟还要咬着牙起身，走了几步路，还说自己没事。他这样做明显是错的。最后，他人死了，却被捧为钢铁战士，这不是还要其他人去向他学习吗？这就是那个时代对那一代年轻人的教育啊。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害死了许恭生。那个失去理性，失去人性的疯狂时代，是造成许恭生死亡的根本原因。

清华百年校庆时，我专程到了许恭生倒下的地方。当年土路旁的小杨树，已经长成了参天的白杨。原来的土路，已经变为宽敞的柏油马路。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许恭生，就倒在了这里；幸存的我们，今天也已经两鬓染霜。旧地重游，感慨万分。

D. 可怜的许妈妈

许恭生英年早逝了。他把一切苦难都留给了他可怜的妈妈。

如果许恭生知道自己生病了，没有参加 5.30 的武斗；如果许恭生没有和老四结下了那么多仇恨；如果许恭生在武斗现场不是冲在前面，退在后面；如果他受伤以后不起身，不走那几步路，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大喊大叫；如果他被及时送进医院；这么多条如果，只要有一条就行了，他就不会死了。唉，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许去世后，我才听说他家是三代单传；到了他这一代，才幸运地有了两个孩子，他和他的妹妹。许恭生考进了清华大学，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听说：在 60 年代经济困难时期，许家生活困难，只好把他的妹妹送给一个黄姓人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他的母亲。许恭生的母亲曾在南昌的一个街道工厂工作，后来，这个街道小厂关门了，我们寻找许恭生家人的工作就此中断了。

我们班善良的同学们，在许恭生的母亲和妹妹来京期间，陪伴着她们，尽量排解她们的忧伤。

死者长已矣，但世上还留下了活着的人们啊，许恭生把一切悲哀和痛苦都留给了他那可怜的妈妈。让白发人为黑发人送葬，这岂不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许恭生哪里会想到，他会在武斗中死去；他不仅不能尽孝，反而给他的妈妈带来终生无法治愈的伤痛！

许恭生的妹妹当时是解放军南昌某医院的护士，是一个现役军人。不懂事的妹妹还没有长大，还不懂得分担母亲的哀伤与忧愁。许恭生留下了他的孤苦的妈妈和还没有长大的妹妹，就这么走了。

听说蒯大富给了许恭生的母亲一些钱，但是，许恭生的母亲表示了高姿态，不要这笔钱。许恭生当时被埋葬在清华的荒岛，据说是为了永久的纪念。但是曾几何时，又听说许恭生的坟墓被从荒岛移走了。如今的荒岛上有纪念吴晗的“晗亭”，荒岛上曾埋葬过许恭生的历史早已被雨打风吹去。

1968 年年底，我们班所有的同学已经分期、分批地分配了工作。我们班的同学是非常善良的，大家都对许妈妈寄予了充分的同情。分到江西南昌附近的同学，主动地承担起看望许妈妈的任务。这些年轻人一到节假日就去看望许妈妈，他们想给许妈妈一些安慰，想分担许妈妈的一些忧愁，想帮助许妈妈做一些事情。但是，许妈妈每见到他们一次就哭一次，这样的情况使这批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许妈妈后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我见到你们我就又想起了银波。银波要是活着，也像你们一样工作了。一见到你们，一想到此，我就更难受。”就这样这几个同学才终止了对许妈妈的探望。可怜的失去了儿子的老妈妈，这么多年来你受了多少煎熬啊！

如果我们能够把阴曹地府的大门打开，让许恭生重新回到我们的班里，我相信无论要我们班的同学付出怎么样地艰辛，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拉他回来。我相信，如果他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班，让他重新选择的话，他绝对不会去参加这场两派的武斗。

如果，如果，但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如果了！

E. 关于许恭生之死的几种说法

a) 所谓的“被土坦克冲倒”

1968年6月，团派总部发了一个文件：《首都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关于许恭生烈士的鉴定》，以下简称为《鉴定》。我要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杨汉祥，是他珍藏了这份历史资料。

我拿起了这薄薄的四页纸，感到它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上，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慢慢地、一句话一句话地读着，多么熟悉的措辞，多么习惯的用语。有一些地方，由于时间太久，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由于我熟悉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猜出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是什么。本书后面附有《鉴定》的原件照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把《鉴定》按原文重新打印。

《鉴定》中写道：恭生烈士文攻是闯将，武卫是先锋。由于他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优秀的指挥才能，大家推选他为连队的指挥员。他指挥连队打了很多大胜仗。

老四有人说，许恭生是老团的武斗总指挥，看来是一个误传。应以老团的文件为准，他只是个连队的指挥员。在武斗中，他的表现的确是大无畏的、是勇敢的；他指挥他的连队打了很多大胜仗。无论是老团还是老四，这是双方都公认的事实。

但是打仗是双方的事啊！他的连队打了很多大胜仗，那他的对手就打了很多的大败仗喽！打了大败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流血，有人受伤。请问：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谁流血了无所谓？谁受伤了记不住？当然了，流血的人牢牢地记住了是谁扎了他一长矛，使他的鲜血流了出来；受伤的人牢牢地记住了是谁把他刺伤的，差一点就要了他的一条命。就在许恭生向他的老团战友显示他的战果，显示他的长矛尖上的血迹时，他指挥他的连队打的那些大胜仗，在被他打败的那些老四的心里，早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鉴定》中还写道：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在这场惊动全北京的井冈山保卫战中，414变天派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疯狂武斗升级，公然出动土“坦克车”，冲击我井冈山战士。在这紧急关头，恭生烈士奋不顾身，站在最前头，顶住414暴徒的猖狂进攻，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万恶的414暴徒用土“坦克车”冲倒在地，身中二十余长矛，当场壮烈牺牲！

5.30那天，数百个老四排成了作战组，一起向西推进，许恭生一个人是无法挡住的；是数百个老团一起挡住了老四。所以《鉴定》中说是他顶住了老四，那就言过其实了。

5.30那天，在向东推进时，他站在武斗队伍的最前面；在后撤时，他又在队伍的最后面。他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掩护战友。

《鉴定》中说他是被老四用土坦克车冲倒在地，这就和事实相去甚远了。5.30那一天，老四确实是三次出动土坦克，两次是在凌晨6点前后，另一次是在中午。许恭生在武斗现场确实摔倒在地，确实被对方刺中二十多长矛；但是，他倒地被刺是在上午七点钟，那时东大操场上根本没有土坦克，他绝对不是被土坦克冲倒在地的。而且，5.30那一天，土坦克没有碰到过双方的任何一个人。

《鉴定》中说他当场壮烈牺牲，这又和事实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上午七点钟受伤的，拖到下午，才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才闭上了眼睛。可以肯定地说，许恭生不是在武斗现场当场死亡的。

2008年12月29日，在清华同学深圳聚会上，我问蒯大富：“许恭生是怎么死的？”蒯答：“土坦克撞死的。”我问：“是你在现场亲眼看到的吗？”蒯答：“当时我站在5号楼和12号楼中间那条路北口，离许很远，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说：“我做了调查，许恭生在后退中不慎摔倒，被上来的老四扎了20多长矛，拖到下午才送去积水潭医院；许失血过多，死了。”老蒯没有说话。

李自茂在《东流去》179页中说：团派的许恭生死于天亮前的打援时，当时四派的人跟着土坦克从东大操场（高压实验室方向）冲过来，……。为迎合《鉴定》中被土“坦克车”冲倒在地的说法，李在这里将许受伤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他这样做是越描越黑；因为他把许恭生被耽误送医院抢救的时间，又加多了一个小时。

b) 所谓的“军用刺杀服的下摆被挑开”

团派总部委员×××在清华校友网上说：“许恭生带队后撤，在后撤中，许的位置突前，被石头绊倒，四派有十多支长矛刺向许。许穿的是正规的军用刺杀服，有较好的抗刺力，有人将其下摆挑开，刺中了股动脉，致其流血过多，在送医院途中已不治。”我们感到他所说的情况是不合情理的。

首先，能够看到许恭生的下摆被挑开这么细微动作的人，一定就在许恭生的身旁。如果这个目击者是老团，那他为什么不去帮许恭生一把，把许拉起来？事实是，当时许恭生周围的老团，早就跑光了。那么，这个目击者就应当是老四了；但没有任何一个老四说，他看见了将许恭生的下摆挑开这个细节。

我们访问了5.30那天与许恭生在一起的老团、还有参与对阵的老四，他们都说，记得许恭生当时没有穿着正规的军用刺杀服。

5月14日夜晩，老团集结队伍，想抢夺已被老四占领的汽车楼。三个先行冲进一楼的老团，听到老四的李文忠学习班要来增援，就丢盔卸甲，翻窗逃跑了，给老四留下了3支长矛、两套盔甲和一套军用刺杀服。也许是这个原因，许在5.30上场时，就没有军用刺杀服可穿了。

既然许恭生那天没穿军用刺杀服，当然就无人将其下摆挑开。那位团派总部委员说什么许穿的是正规的军用刺杀服，说什么有人将其下摆挑开，就完全是无中生有。他这样做，是带着派性在编造清华园文革的历史，以渲染对老四的仇恨。

李自茂在《东流去》179页中，不加查证，就把有人将其下摆挑开的说法，照抄一遍，将卑劣的谎言当成事实。这种行为只能用派性当头来解释了。

团派总部委员陈继芳在《1968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中，提供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相片中许恭生的确穿着一套很特殊的服装，这就是那套军用刺杀服，看到这套衣服的下摆了吧。

c) 无中生有的“血流如注”

老团的总部委员陈育延同学，于2009年12月6日在清华校友网上发表了《科学馆的十天——我被414囚禁的日子——兼读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有感》。她说：唐金鹤对许恭生之死的描述，可以很明显地感到，她居然把责任推给了团派，在所谓的“忆恭生”中有一节题目叫“延误送医，失血过多而死”，胡扯什么许恭生是由于“延误送医”而死的。谁都知道许恭生是被刺了二十多矛而死的，腿动脉刺穿血流如注的速度，是等不到送医院的。不知道她这个工科大学生，什么时候开始改行作“医学鉴定”了。这个结论是来自臆测，还是来自派性？

针对陈育延同学的这段话，我想向陈同学请教下面两个问题：

1) 5.30那天，许恭生何时受伤，受伤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据我们调查，许恭生是早上七点钟左右摔倒，然后被一拥而上的老四扎伤的。他从现场被背回来时，能说话，能走动。而陈同学提供的情况是：“血流如注”。请问：这个“血流如注”的情况发生在何时？发生在何处？陈同学后来自已撰文说，5.30时她正在静斋养病。那我不明白了，她是怎么知道许在“血流如注”的？

2) 许恭生是什么时间送医院？什么时间闭上眼睛的？

我们的调查结果是：许恭生受伤后，起码拖延了五、六个小时才送医院，实在是太迟了，救不了了。

按照陈同学的说法，许是上午七点左右被刺伤的，然后如注地流血，他应当活不过上午七点半，哪能拖到下午？这也难怪，陈同学这个工科学生想编造医学谎言，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对于许恭生的死因，我们是这样写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害死了许恭生。那个失去理性，失去人性的疯狂时代是造成许恭生死亡的根本原因。

陈同学并没有仔细地看看书中的分析，便武断地、无中生有地说：“把责任推给了团派”；看来，带着派性在那里“臆测”、在那里“胡扯”的，恰恰是陈同学自己。

建议陈同学改一改以前那种趾高气扬、蛮横骄纵的“左派”脾气，遇到争论，要摆事实讲道理，做一个比较有修养的人，好不好？如果你认为你有理，你有话，尽可以心平气和地慢慢说嘛！

李自茂在《东流去》中引用周戴维、鲍长康的话，和精仪系制91班高子正在清华校友网上的话，反复强调许恭生是当时就死了。他和陈育延一样，不顾事实，带着派性，在那里瞎编、胡扯。

李自茂在《东流去》175页和204页中，引用周戴维说的话：你们知道许恭生受伤了吗？流了好多血，可能现在已经死了。周戴维说的是他的主观想法，用的词是：可能。但到了205页，鲍长康的回忆就变成：周戴维在天蒙蒙亮时，到浴室西侧告诉我，土坦克冲来，许恭生掩护大家撤退，被脚下坑洼仰面跌倒，众老四一拥而上，用长矛刺死了许恭生。在这里周戴维的主观想法从可能变成了客观事实：众老四一拥而上，用长矛刺死了许恭生。

许从可能死了，变成肯定死了，被长矛刺死了。许恭生当时就死了的谣言，就这样诞生了。真不知道应该把造谣的功劳，归功给他们中的哪一位，周戴维？鲍长康？还是李自茂？

如果许恭生像李自茂所说，在早上6点就受伤了，许伤得又很严重，那么，按照常理，即使许已经没救了，老团也应当不迟于早上6点半就送许到医院抢救。实际上，许是拖到下午才送去积水潭医院的。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许恭生受伤后能说话，能走动，麻痹了老团，而耽误了抢救的说法是合理的。

《东流去》213—214页中引用高子正的话：

许恭生被抢回来时就没救了：血流的太多，又被刺中了股动脉，长矛带有“血槽”。……很快的，两排人员战成一团。……当我转身‘逃跑’时候，看见的是右前方不到5米远的地方许被十多根长矛刺中，缓缓倒下的镜头，那是我铭刻在脑子里的镜头。……跑了一二百米，遇到了团派的另一支队伍，约50多人。我们求救；他们立即直追，打退了刚才那批老四。我看到，5到6个人，抬着拽着许恭生向回跑，许的头盔掉了，脸色煞白，四肢无力的耷拉着，鲜血一股一股地流着撒在地上……后来，我听说，许恭生被长矛刺中大腿的动脉，流血过多，当时就没救了。

高子正的这段回忆有很多问题：

1) 两排人员战成一团。什么叫战成一团？是双方抱在一起，互相扭打；还是互刺、互咬？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纯属虚构。

2) 许被十多根长矛刺中，缓缓倒下的镜头，那是我铭刻在脑子里的镜头。瞎编。事实是许恭生自己在后退时先摔倒，后被老四扎伤；绝不是高子正所描写的，被老四用长矛刺倒的。

3) 当我转身‘逃跑’时候，……跑了一二百米，高子正从许恭生的左侧逃跑了一二百米，那已经跑过了九饭厅。他真的跑了那么远吗？又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吧？是不是吓糊涂了？

4) 我看到，5到6个人，抬着拽着许恭生向回跑，又是虚构；许明明是我们班的陆××，趁两派脱离接触的空隙，背回去的。还有什么“50多人……立即直追，打退了刚才那批老四。”更是无中生有；编得再生动，也是假的。

5) 鲜血一股一股地流着撒在地上，这大概就是陈育延所说的“血流如注”的出处吧。

高子正的回忆短短三百个字，却错误一个连一个。如果这就是他头脑中的5.30，那他的大脑一定出毛病了。可怜的是，这样的材料竟被李自茂当成写作《东流去》的脊梁。

关于许恭生之死，在李自茂的书中罗列了各种讲法。同一个周戴维，在175页中说许可能已经死了，到205页就变成，众老四一涌而上，用长矛刺死了许恭生。在179页中，李综合了各种传说，有团派的许恭生死于天亮前的打援时，当时四派的人跟着土坦克；有有人将其下摆挑开；有在送医院途中已不治等等。到了213页，铭刻在高子正脑子里的镜头，就变成许被十多根长矛刺中，缓缓倒下了。李在书中所罗列的，只不过是老团的某些人，他们之间的传言与臆想，是一堆大杂烩。李自茂活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长舌妇，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唠叨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流言蜚语，他哪里是在写历史啊？！

d) 许恭生之死该不该写出来？

我把许恭生之死的第一稿发给孙毓星，孙看后说：“太残酷了，都不忍心看下去。要是事实

真如此，那就不应该写，影响不好。”其夫人孙铮则对我大肆恐吓，她恶狠狠地通知我：“你不要写，否则，你要文责自负。”目睹了建国以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我，当然明白孙铮的意思；自从决定要写《倒下的英才》，我就已经作好了文责自负的准备。对孙铮的恐吓，我一点都没有害怕；倒是孙毓星的慈悲菩萨心肠，大出我的预料。

我想问问孙毓星：既然你不忍心看到许恭生之死的那些文字，那么，当罗征启老师被迫站立了80个小时而晕倒时，你本人就是这批施恶者的头头；当冯家驊把开水倒入罗老师口中时，冯就是你的部下……你当时又怎么忍心去看就发生在你眼前的这些暴行呢？

在校友网上也有类似的言论：“写得太残酷了，使得我们都不忍心看下去了。”我要问问这些人：清华武斗中死了那么多人，哪一个人死得不悲惨？哪一个人死得不残酷？是不是都不应该写出来？请问：是这些事实本身残酷，还是作者在这里舞文弄墨、把本来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小题大做、写得太残酷？不要以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斋念佛、慈悲为怀的善男信女。当开水倒入罗征启老师口中时，当有人从活人口中拔牙时，当有人几个小时就活活打死孙华栋时，今天说出“都不忍心看下去”的人里，有的人当年就在事发现场，他/她们当年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时，他/她们都忍心看得下去，他/她们都没有上前制止，可能他/她们觉得这些都不残酷吧；今天，我只是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大白于天下，这些施暴者和施暴者的帮凶们反倒站出来了，说太残酷了，他们不忍心了，看不下去了。他们倒打一耙，骂我“心肠狠毒”。以骂我“心肠狠毒”的方法来制止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这可能吗？

老团的总部委员×××在校友网上公开写道：“息怒，那书别细看，大家没事都不要自找不自在，该忘掉的一定要努力忘掉。”“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就那么一点破事，还提它干什么？又不是什么好事，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过去就过去了。提这些陈皮子，烂谷子，干什么？！”哦！原来你们也知道杀人、放火不是好事，不光彩；重提这些事，你们不自在了。当年，你们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个个都是好样的清华学生，你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恶魔了？你们是在什么心态的驱使下，去干你们心知肚明的那些不好的、不光彩的事呢？清华两派武斗死、伤数百人，这是就那么一点破事么？这个点得多么大，才值得一提，才值得一记啊？你们想要两万清华人和你们一起都失忆？你们自己可以假装忘记，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你们过去的恶劣行径，也会记住你们今天的丑恶嘴脸。

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当年的清华大学，光天化日之下，一些人就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连进校制止武斗的首都工人师傅们都被他们随随便便地杀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试问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事情？古今中外，杀人偿命，放火收监，此乃天经地义。但是，到讲民主、讲法制的今天，在清华的校友网上竟然有人不让写下这段历史，让善良的受害者放纵施暴者，天理何容？

□ 摘自《倒下的英才》唐金鹤著

~~~~~

## 【诚心忏悔】

生命的暗夜

• 陆晓娅 •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 50 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么就是“革命”的对象，

要么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柯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嚓”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

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骂“×××（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40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

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儿，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儿结束，快点儿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 原载《我们忏悔》

~~~~~

【史实辨正】

用推理探寻历史真相
——答刘进、宋彬彬对我质疑的回应

• 华新民 •

宋彬彬和刘进二位女士对于笔者在“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以下简称“拾遗”，见《文革博物馆通讯》zk1408d）中提出的质疑作了回应，（见《记忆》总122期，2014年1月30日出版）很赞赏和感谢她们的这种认真态度。不过，坦率地讲，读完她们的回应，心

中的疑问并没有冰释。原因在于，他们的回应或解释，仍然以重申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以及对于家庭的介绍为基础，而没有提供更多其他方面的证据。她们只是强调：她们在1966年8月19日退出校文革领导机构，就是出于本人对工作路线错误的认识，尽管所有跟他们地位相似的学生领袖如陈小鲁、贺鹏飞当时都没有这样的认识。同样地，宋彬彬强调，她的父亲就是对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照，尽管别的高级干部如陈毅、杨勇等都这么做。

这就涉及到一个讨论历史问题时常遇到的问题：当事人的叙述是否可以当作历史的真实来采信？笔者认为，这种叙述固然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只是一面之词，需要从时代、社会等多方面的史实考证对之加以证实或者证伪。如果这种叙述是关于一些历史事件，考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因为历史事件常常涉及到多人，或者被多人所目击，当事人叙述的真伪可以从其他人的证言中得到判断。如果这种叙述是关于当事人自己的思想活动，考证就困难得多。其原因是显然的：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是没有旁证的，本人的叙述似乎是唯一可靠的证据，不容旁人置疑：“你不是我，安知我的思想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是显然的：一个人的思想，并不等于其本人的说辞，即使此人曾把自己的思想告诉过别人，或者把它写进了日记，人们还是有理由质疑他是否说了真心话。这样的质疑，有两层理由，第一层的理由是，叙述者为了某种利益或目的，有故意讲假话的动机和可能。更深一层的理由是，由于人皆有之的趋利避害本能和自我美化倾向，叙述者会讲一些冠冕堂皇——西方叫做“政治正确”——的话，把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思想掩盖或包装起来。这些掩盖或包装常常是在下意识中完成的，叙述者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也就是无意间的“自欺欺人”。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阅读和研究历史人物叙述的自己某种行为的动机时，不会全盘接受他们字面上的说法，而会探究这些言辞背后可能隐藏的真实思想和动因，人们会从时代、社会等方面去寻找一些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事实，通过分析比较等方法来鉴别当事人对自己内心活动的叙述。笔者在“拾遗”一文中提出的质疑就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比较所做出的。在刘进和宋彬彬的回应中，这些方法被不屑地称为“推理”。

笔者在这里老实地承认，“拾遗”一文中用来质疑刘、宋二位女士回忆的方法，确实是一种推理。不过，这种方法具体来说，无非就是对时代氛围进行分析、同相似环境下其他人物的思想行为进行比较，只要它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其实就是一种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尤其是对于涉及人物心理活动的历史考证来说，这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研究方法。排除这样的方法，那就等于主张只有当事人的说法是唯一可以采信的陈述，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历史研究吗？大家知道，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毛泽东的谈话（如关于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斯诺等人的谈话）、《赫鲁晓夫回忆录》以及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都是当事人对自己思想行为的第一手陈述。试问，我们能够全盘接受他们在其中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吗？如果你对这些史料存疑，除了上述的“推理”方法外，还能用别的什么方法来鉴别呢？进一步说，上面列举的历史人物的著述和言论，都是当事者对自己近期思想行为的陈述，有的甚至是对自己内心活动的即时记载，而刘、宋二位女士关于自己退出学校领导班子的陈述则是对自己在1966年8月18日的思想活动的回忆，她们就那么有把握肯定，经过四十多年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其间“政治正确性”的定义几度正反易位——自己在那几天时间里的思想确实就是现在记忆中的那样吗？

所以，笔者觉得纠缠于“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只能流于无谓争论，不如继续“拾遗”中刘、宋二位女士不以为然的“推理”，再摆一些事实，再讲一些道理，用更多的史料来充实师大女附中在八八之后那段几乎空白的历史，以寻求当年更接近于真相的社会氛围和人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读者对刘、宋二人对自己当年行为所作的解释有多大的置信度便自会有公允的评估。

本文摆的第一个事实来自米鹤都编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一书中所载的孔丹的回忆：“……到9月下旬，我们就听说陈伯达讲话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

的消息，我们这几个西纠的负责人就在十一前后离开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联。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西纠的事情。除了中间回过一次北京之外，一直在外地串联。而西纠在完成国庆节的维持秩序任务后，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快，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西纠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见该书“西纠及其通令”一节）米鹤都考证了陈伯达讲话的具体时间：“1966年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他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革命。”（见该书注13）。

笔者在“拾遗”中说高干子弟在十月之后普遍退出文革运动的领导，上述事实具体给出了日期和原因。所以精确来说，刘进和宋彬彬在8月19日退出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比其他学校里的高干子弟至少早了37天！更为不寻常的是，其他干部子弟退出领导，都是因为陈伯达的个人“建议”，实际上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而刘、宋二位的辞职却是因为认识到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路线性的错误的自觉行为。同样的事实还有，所谓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在陈伯达讲话之后的10月1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中正式提出来的。宋彬彬在回应中这么说：“……从7月底工作组撤走，到8月19日退出学校运动的20天里，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跟不上，看不懂，自认为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一直处于寻求革命之路而不得答案的苦闷彷徨中。女附中不少学生的特点就是‘叫真儿’，不懂的就不能强迫我们就‘懂得’，所以听了梁二同的责备，我们就退出了学校运动。”笔者理解，宋彬彬在这里的意思是，女附中有特殊性，不少学生（包括刘、宋二位）“叫真儿”（我想应该是“较真儿”），所以远早于其他学校的学生就觉悟到工作组的路线性错误。也就是说，她们本人、师大女附中这所学校、以及她们的家庭就是与众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笔者不否认有一些学生在工作组错误这个问题上有先知先觉。然而，根据个人的经历和对于文革史料的阅读，一个人对于工作组的所谓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是同他/她个人受到的工作组的压制相关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最早要求追究工作组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那些在工作组时期受到镇压的人，没有例外。师大女附中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刘进在回应中说：“反工作组的同学声泪俱下、推心置腹，对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指得明明白白。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可能还要继续当这个筹委会主任呢？”不寻常的地方是，作为原来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刘、宋二位竟然那么轻易地接受了曾经的对立派同学的认识，早早地让出了文革的领导位置，在北京的大中学校里独一无二。不寻常的行为是需要不寻常的原因来解释的：那些原先反工作组的同学，究竟是如何“声泪俱下、推心置腹”地向刘、宋二位指出她们的错误的？她们所指控的“严重”的“这么大的错误”究竟有哪些？刘进说她们“指得明明白白”，我们读者却如坠雾中。另一方面，按宋彬彬的回忆，她们辞职后不久，学校文革的领导班子就散摊了，这难道就是这些同学锲而不舍追求的目的吗？……类似问题都是我们在寻求女附中文革历史真相时需要澄清的，最好莫过于反工作组的同学中有人能够出来讲述一下她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然而，在关于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资料中，这些同学的面目却始终十分模糊。她们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仅出现在刘进和宋彬彬女士的回忆中：是她们在八一八之后同刘、宋二位的谈话，使后者辞去领导职务。除此之外，她们在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女附中的1966年八、九月份的文革资料中，大部分回忆集中在卞校长的死亡事件，其余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关于“对联”盛行以及因此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回忆，这两者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关于工作组的“错误”和学生对它的追究，却没有看到什么回忆资料。尤其是，反工作组的同学关于自己在那一段时间内遭遇的回忆，完全阙如。仿佛在“逼退”了刘、宋之后，她们就“人间蒸发”了。既然她们对工作组有那样痛心疾首的认识，这些同学的失踪是颇为离奇的。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同学应该都在世吧？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讲一讲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看来，工作组所犯“错误”究竟有多严重？是什么让她们“声泪俱下”？是因为上天安门没有轮到自己？还是因为惨遭工作组迫害？在刘、宋二位辞职后，她们对工作组进

行过怎样的追究和清算？假如真发生过这样的事，将是师大女附中文革史的重要内容，她们或其他亲历的同学的回忆将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当然也有助于澄清刘、宋二位女士辞职的真实过程和原因。

如果说要求清算工作组错误的同学在八一八后神秘“失踪”的话，下面要摆的一个事实是女附中有一批跟她们对着干的同学在8月25日成立的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中显露了踪影。同样是在《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一书中，孔丹回忆道：“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如果孔丹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师大女附中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刘进和宋彬彬辞职之后参加了“西纠”组织，而且成为它的半壁江山。不少人回忆“西纠”有许多打砸抢的行动，对此孔丹等人是有异议的，这里不拟探讨这方面的争论，但是有一些行动，孔丹直言不讳：“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他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的，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起因都是当初受工作组迫害的大学生要追究工作组的错误。笔者在“拾遗”中已经指出，1966年的八、九月份，是要求清算工作组错误的人同对立派的相持阶段，前者常常处于弱势。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戴维堤在他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说：“‘北航红旗’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组回院作检查。1966年8月25日，我和头头们带领几百名学生举着‘北航红旗’的大旗，来到了国防科委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赵如璋回学院作检查，从此开始了北航红旗艰苦卓绝的‘二十天二十八夜’揪工作组行动。……北航红旗的‘静坐、示威’、揪工作组行为一开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院内的反对派和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天天来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各种吓人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这里所说的赵如璋是国防科委向北航派出的文革工作组的组长，那些要求追究他错误的行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谓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则应该就是“西纠”红卫兵，因为当时“联动”这个组织还没有成立。（顺便说一句，这是记忆发生时间错位的一个明显例子。）戴说的“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显然就是孔丹所说的“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的一部分，发生在8月25日后的二十八天之内。

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学生在本校的文革中不见踪影，也没有资料显示她们在社会上起任何作用。而上面所摆的事实却显示，师大女附中的另一批红卫兵，有几十人之多，在8月25日之后成了“西纠”的主力部队之一，她们在社会上同要求追究工作组错误的大学生发生冲突，甚至动手打人。显然，她们不属于宋彬彬所说的“较真儿”的同学，是对工作组“明明白白”的错误完全没有认识的人，不仅没有认识，而且反对追究工作组的错误。那么，问题来了：当刘、宋二位因为认识到工作组的错误而辞职的时候，这批人站出来反对过吗？她们同本校那些追究工作组错误的同学发生过什么冲突吗？

总之，基于笔者在“拾遗”和本文中的“推理”，围绕刘、宋二位因何辞去女附中文革领导职务这个问题，存在下列需要澄清的疑点：一，工作组在1966年六、七月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在师大女附中究竟犯了多大错误？他们对学生的镇压究竟有多严重？有多少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被整了“黑材料”？二，在工作组撤走以后，那些原先受工作组压制的学生除了“逼

退”刘、宋以外，还有哪些追究活动？有没有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一类的活动？在北京全市的批判工作组的学生组织中为什么不见女附中学生的踪影？三，刘、宋辞职之后，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是否有一个领导机构？谁在其中主导？她们有哪些不同于刘、宋的方针和行动？那些参加“西纠”的同学，看来在8月25日前已经组织起来了，她们是什么时候组织起来的？她们同校文革的领导是什么关系？

笔者到目前对于上述疑点的回答是：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对反对派学生的压制并不严重，没有人被打成反革命，也没有人被整过“黑材料”。因此，在工作组撤走后，也不存在要求平反和销毁“黑材料”的问题。在刘、宋辞职之后，领导权并没有落入那些原先反工作组的同学手里。事实显示，可能性更大的是，落入了后来参加“西纠”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阅读所及，迄今没有看到相反的回忆和资料，只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可见跟北京其他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相比较，女附中没有什么独特性，大同小异而已。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中共历次运动的政策中，对中学生的政治惩罚是比大学生轻的，比如“反右”时中学生是不划右派的，所以中学的工作组残酷镇压学生的例子远不如大学里多。在那些高干子弟众多的中学，如师大女附中、四中和八中等学校里，批评工作组的学生中，领头者也常常是高干子弟，工作组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格外小心。这也可以从下列观察得到印证：与大学里不同，北京中学里文革派别之间的对立，主要不是起因于对工作组的评价不同，而是因为对血统论及其代表“对联”的评价不同。浏览北京中学的文革资料可以发现，对血统论危害的回忆和反思数量上远远超过对工作组迫害的回忆。

当然以上只是“推理”，笔者期望女附中当年的同学，尤其是那些反对过工作组的同学，能够出来推翻上述答案。否则，所谓工作组的严重错误究竟存在于当年的现实中，还是仅仅存在于刘、宋二人今天的记忆中，就是一个疑问。从而，她们的辞职是否真是因为认识到工作组的错误也将始终是一团消散不去的疑云。

2015年2月4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